

和王兵在一起的日子

○马国馨（1965 建筑）

王兵，1963年9月出生，祖籍辽宁，198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体育建筑设计工作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2011年6月17日因病去世，终年47岁。本文是马国馨院士为《剑锋犹未折——建筑师王兵》（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一书所写的序言。

王兵是2011年6月17日离开我们的。他走的时候刚刚47岁，按说正是精力充沛、经验丰富，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却因患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同事和创作集体，离开了他所热爱并执著的事业。回想起来，他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24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也就是12年的时间是在四所——我们这个创作集体里

度过的，我们一起设计、加班、讨论、出差、下工地，也眼看着他结婚、生子，成长为设计院的技术骨干、副总建筑师。

王兵是1987年7月10日到院科研楼十层的亚运会体育中心设计组来报到的，在我的工作日记里有专门的记录。当时我还不清楚他为什么点名要到这个设计组来，后来知道他和已在设计组的董笑岩的关系以后，稍微明白一点，因为此前小董的研究生实习和毕业后都在我们这里工作，我想可能和小董的介绍有关。那时王兵还是24岁的年轻小伙子，虽在北京生活很长时间了，但言谈中还时常露出一一点东北口音。还记得在国庆节前，院里在月坛体育场举办运动会，王兵听说了也跑去代表四所参加，回来还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他短跑拿了个第一名，可是坐在那里刚过了没一会就脸色煞白，说心脏不好受，可能是运动太激烈或是准备活动没做好，把我们都吓坏了，赶紧送到阜外医院急救，幸好有惊无险。

在一起工作的12年中大的事情有三项，1990年前是亚运会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1991—1992年是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1993—1999年是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扩建工程（当然其中穿插了若干零碎的投标竞赛和方案）。首都机场工程结束后，设计组就解散回所了，此后申办2008年奥运会，几次设计竞赛和



马国馨（左）、刘开济（中）与王兵在一起（1990年）

评估时都有工作接触，但那时王兵已经是独当一面，带领庞大的设计团队，对相关工作全面负责的主要人物了。

王兵到亚运会设计组时，规划方案已经确定，三大比赛场馆的建筑方案也基本成形，他很快投入闵华瑛领导下的体育馆的设计。因为施工单位很快就要进入施工现场，所以抢设计图纸的任务十分紧张。王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熟悉了工作，并发挥出了自己的创造力。记得在体育馆南部门厅的处理上想了不少方案，最后正立面入口处的特大水平圆雨水管就是采纳了他的主意。在工程中崭露头角是第二年，他负责了曲棍球场的主要设计工作。这是体育中心四个比赛设施中最后开工的一项，也是国内第一座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曲棍球场，虽然观众席只有2000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当时还全部是手工绘制图纸。1988年7月初步设计交指挥部审查，10月施工单位进场，月底就完成了全部施工图设计，这也是以王兵为主要设计人员完成的第一个工程。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最后验收是1990年7月9日，正好是王兵到设计组整整三年的日子。

在亚运会设计图纸完成后配合施工的过程中，还曾参加过几次设计竞赛，王兵都是主要参加人员。一个是1988年4月的天津体育馆竞赛，也是我们设计组参加的第一个竞赛，我们做了认真的准备，最后获得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1989年3月，日本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的国际竞赛开始报名，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正规的国际设计竞赛。其设计文件、规定、答疑、手续均十分严格，院里在刘开济总领衔下，刘力和我以及一

批年轻同志都参加了紧张的工作。在大方案确定以后，王兵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完成基本图纸的工作，并在9月送交了方案和模型。从该竞赛发表的最后审查报告看，在预审和共三轮审查中，中国送去的15个方案中，有3个方案进入了第二轮，即北京院、建设部院和同济大学的方案，但在最后一轮的审查中都被淘汰。这次参加国际竞赛除了发现我们在理念、表现、制作等方面的差距外，还暴露了在体制、职业等方面的一些不足。1989年11月，我们参加了武汉天河机场的设计竞赛，因为当时已经得到首都机场将要扩建的消息，所以也以参加这个竞赛作为一次热身和练兵。我和王兵一起把图纸和模型送到武汉去，那时已是年底，当天晚上在旅馆住下时已经很晚了，只记得客房里不知什么原因冷得要命，王兵和我连棉衣都没脱，和衣蒙头将就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才发现有一扇窗户大开着！

1990年8月，我们还参加了西客站的设计竞赛。当时院里决定由一所和四所按照中国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分别做两套方案送交。实际上除建筑形式外，我们在交通组织、人流车流和物流的分配、改革车站设计基本模式上还是动了很多脑子。11月底提交方案，当时采用的是白色的小中药水丸充当模型底板上的树阵，设计组包括王兵在内的年轻同志花费了整整一个通宵粘这些药丸。后来又陆续修改了两轮方案，第二轮方案就是由王兵提出的两个流线型的圆筒组合方案，这种体形对于北立面为主的建筑物还是有不少优越性的，并采用了当时还是很少用的银白色面层饰面（当时的饰面材料还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 师友情

结果评选时，铁道部一个副部长揶揄说：“北京院给我们做了两个大高炉！”（实际上他是要支持铁道部的方案）后来有关领导执意要采用中国古典风格的方案，加上我们很快又接手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于是西客站就告一段落了，但这段经历对于了解大型交通建筑人流、车流，地下地上的各种流线组织以及处理与城市的关系等，为我们后面的机场设计积累了许多经验。

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是从1991年3月开始，陆续到1992年5月申报书完成，此后准备国际奥委会的考察以及1993年1月正式提出申办报告。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除单可民和我两位老同志外，还有王兵、陈晓民等年轻同志参加。因为我国是第一次申办，所以没有经验，除了要了解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研究历届奥运会申办国和主办国的相关报告外，还要到国家体委各相关部门了解比赛规则和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规划比赛场馆、练习设施、运动员村和相关设施的选点、用地，以及哪些是新建，哪些是改扩建。当时我们这个工作班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效率还很高，而且当时计算机技术也有了较大进展，但还需要设计人员和计算机所合作完成有关图纸和表现效果图，这些都由王兵他们年轻人来完成了。最后的申办报告共分三册457页，第二分册的场馆设施就占



2002年，王兵（前左2）与参加北京奥运方案工作的同事在一起。前排左3、4为清华校友朱小地、马国馨

去了316页。在其中的新建设施里，包括室内自行车赛场、水上比赛、马术比赛项目等，在国内都还没有建成的实例。而且所有的比赛设施里涉及比赛场地、观众人数、记者、贵宾、官员、赞助商的设施和面积等，都需要得到25个比赛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检验和批准，那真是细微而又繁琐的工作。另外，主会场的规划设计方案也是由王兵主要执笔完成。当时把主会场确定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南部，规划方案与北部已建成的体育中心一期在手法上呼应、建筑的对位、交通的处理上都衔接得比较自然。最后供国际奥委会审查的表现模型是由地处北二环的一家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完成的，但他们对制作建筑模型并不擅长，所以为模型的色彩、材料、表现手段、介绍图纸等，王兵和我到那儿跑了好多趟。2000年的申办最后虽因两票之差没有成功，但还是为2008年的申办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在申办奥运会的两三年时间里，设计

组也插空做过一些方案，其中由王兵主要执笔的工程有京津花园、长春兽医大学体育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扩建、现代文学馆等，其中前两个方案付诸了实施。

从1993年到1999年，我们又在一起承担了首都国际机场扩建（包括候机楼和停车楼）的工程。在亚运会工程十几万平方米的任务是由三个所共同完成的，而首都机场几十万平方米的任务完全由一个所来完成，而且这又是除流程工艺以外，其他的建筑设计完全由中国本土建筑师来完成的大型机场工程，所以内容更复杂，参与的单位 and 人员更多。当时除清华同班同学马丽和我作为工程主持人外，王兵、陈晓民、吴凡等年轻同志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工程前期的审批旷日持久，到1995年才最后确定流程和建筑方案，此前由于“夺回古都风貌”的导向，对机场也曾做过若干民族传统形式的探讨，后来随着1995年4月人事的变更，我们认为作为现代化交通设施的机场还应更多地表现时代的特点，于是在研究了修改方向以后，由王兵执笔又重新设计了航站楼的立面方

案，更多地表现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流线型，经过修改的全新立面方案在年底首都艺术委员会的审查会上顺利通过。在此后的建设过程中，王兵也更多地独立承担了建筑外立面的控制和技术设计。记得在大屋面的天沟设计、值机大厅的两侧山墙玻璃幕墙的设计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当时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但在工程指挥部、设计、施工、厂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也充分显示了王兵独自处理现场技术难点的应变能力。

在繁忙的机场工程和现场工作中，王兵还抽空执笔了保定中国银行和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的工程、奥体中心运动员楼、国家体委办公楼改造与方案，前两个工程都是由其他单位完成的施工图。保定中国银行建成效果还可以，我们在建成后经过保定去看过这个工程，还到行长办公室去拜访行长，把行长吓了一跳，因为当时他还拖欠着设计费，看我们来了一大堆人以为是来讨债的呢。

在设计组共事的12年里，除申办奥运没有成功外，另两个实施的大工程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特等奖，得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奖牌。两个工程都获得了国家优秀工程金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北京市优秀工程一等奖。这些荣誉里都包含了王兵在内的全设计组同志们的智慧和心血。

因为工程项目关系，我们设计组的工作地点曾几经



王兵夫妇（左1、2）与同事们（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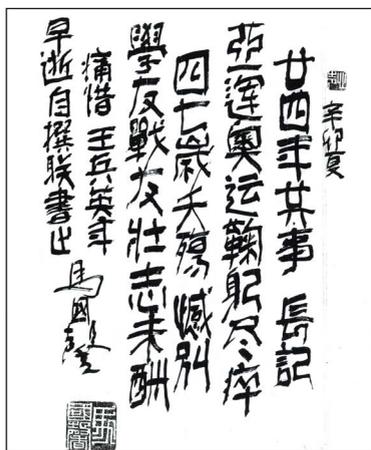
□ 师友情

变迁，亚运会和申奥时在院科研楼 10 层，首都机场时曾在院 A 座 6 层和院外的理想大厦，还有机场的现场办公室。尽管因工作紧张而经常会有讨论和争论，但大家相处和谐而融洽，充满了温暖和亲切的气氛，包括中午的聚餐、自助餐、火锅，包括紧张工作之余的吃西瓜、吃冷饮，包括小组到颐和园去荡舟，到卡拉 OK 唱歌，逢年过节的联欢……我们看着王兵儿子王燕嵩的长大，他加班时经常带着儿子来。为了调研、加工、订货、投标，王兵和我去过天津、武汉、济南、青岛、珠海、深圳、南京、丹阳、保定、廊坊……我们还一起出国考察：1993 年 9 月为首都机场方案设计去加拿大多伦多，美国纽约、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机场调研；1996 年 4 月为机场停车和行李系统去日本东京和大阪考察；2002 年 6 月，一起去洛桑国际奥委会参加体育建筑学术会议，了解有关体育建筑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也介绍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初步安排。王兵和我还同是中国建筑学会体育建筑专业委

员会的成员，经常一起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

我还是比较相信人的血型对于性格的影响，王兵和我们都属于 AB 型血。那时我们设计组中 AB 血型的人有好几个，可能共同的爱好和秉性更多一些。但王兵在平时表现出了更多的细心和热心。1993 年初刚开始做机场方案的时候，王兵在市场上发现了一款立式台灯，从价格、色彩、造型各方面都很好，于是向我们大家推荐，这款台灯经过快 20 年，还被我们家用着。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必须一提的，为了我家里老人去医院看病方便，我考取了驾照并在 2005 年 7 月准备买车，王兵知道以后就把这个任务揽了下来，先是在大热天里花了大半天、陪着我和老伴去亚运村和南三环的车市挑选车型，选定车型两周后又帮着我提车 and 试驾，又过了几天又开车到昌平车管所去办理牌照，然后又领我去他较熟悉的装饰店去贴膜，购买坐垫，最后又找一天把我的车子开到高速路上去跑一跑，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到现在也还没有这个胆量呢！这样我的购车全过程的诸多麻烦就在王兵细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下逐一迎刃而解，以至直到现在老伴和我一坐上车子就要念叨起王兵的好处。

首都机场 2 号航站楼扩建工程竣工以后，王兵也有了更多的独立表现机会和更大的舞台，尤其是在国内两次重大的国际设计投标活动中，即“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和“国家体育场设计方案”，王兵率领庞大的团队投入了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展现了中国本土建筑师的想象力和创作实力。尤其是国家体育场的方案评审，最后入选的三个方案中只有北



马国馨学长为王兵去世撰写的挽联

京院的方案是由中国建筑师独立完成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案，并独创地提出了“浮空开启屋面”的新颖构思。我曾在不同场合，从独特性、戏剧性、经济性、丰富性、可操作性和可拓展性等六个方面进行过宣传和推荐。但是这个可以用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我国设计水准的千载难逢机遇并未被有关方面敏感地抓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缺失使我们眼看着大好机遇的丧失真是可惜。虽然后来王兵和他的团队在国家体育馆的项目中又争得了一次

机会，这是奥运中心区里唯一一座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全部采用国产建材建设的体育馆，从设计技术上也有较大的突破，但在社会的媒体宣传和舆论上又很不给力，也让人很为之不平。

王兵自己曾说：要为事业“付出全部心血而无怨无悔”。我希望通过这个简短的回忆，能从平凡发现高尚、发现敬业，从过程回忆中发现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从而记住和王兵在一起的日子。

2012年4月16日

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黄祖民学长逝世

我校1949届校友黄祖民学长，因病于201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黄祖民，广东中山人。1928年3月12日出生，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9年3月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委、国际部干部；1950年9月任团中央学生部干部、书记处秘书。1952年9月任天津市委工业部秘书，1956年10月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1966年3月任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1979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亚太总分社）副总编辑；1988年4月在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工作；1990年9月任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副局级）。1992年9月离休。

黄祖民同志一生兢兢业业，扎实工作，在不同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勤奋斗，无私奉献。青年时期，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全国学联、共青团中央、天津市委工业部、新华社及

香港分社任职期间，他努力工作、任劳任怨，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奉献于党和国家的新闻事业。曾担任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出访随团记者和亚非会议记者，负责过中印、中越边境冲突的报道。在紫荆杂志社工作期间，他积极履职尽责，广泛联系香港各界爱国爱港人士，以紫荆杂志为平台，在宣传中央对港澳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离休后，他仍然关心香港回归工作和“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力所能及地为香港工作出谋划策。

黄祖民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他恪尽职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作风严谨，深入细致，注重工作成效。他清正廉洁，生活简朴，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他关心群众，团结同志，深受大家的尊敬和拥戴。黄祖民同志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